

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父母 精神健康吗*

张 驰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施海波 张崇尚 吕开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通讯联系在维系家庭亲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现代通讯技术逐渐成为代际间沟通的主要方式,可能会对父母的精神生活与福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农村子女持续外流和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够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水平,子女通讯联系越频繁,父母精神状态越佳,且结果稳健;同时,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对于精神疾病易发的农村女性和老年群体而言,上述联系能够显著改善母亲的精神健康,但未显著改善老年父母的精神健康。这意味着,当前嵌入现代通讯技术的“新时代家书”在改善农村父母精神健康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农村老龄群体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未来农村养老政策制定应关注信息技术变革所引致的家庭养老方式变化,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互补融合,以此有效提升农村老年人群体健康水平。

关键词:现代通讯技术;农村外出子女;父母精神健康;子女精神赡养

一、引 言

“精神健康伴老年,安乐幸福享晚年”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状态目标,关爱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Parker等,2007;WHO,2012)。然而,当前中国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并不乐观,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尤为凸显且更容易被忽视(Lei等,2014)。数据显示,农村地区中老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农村中老年人患有抑郁症的比例高达32.25%,而城镇地区该比例只有21.94%^①。精神健康对中老年人的危害同样呈现出城乡差异,农村地区老年人痴呆发病率和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Wang等,2011;Jia等,2014)。未来,如何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则是推进积极老龄化,以及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不言而喻,农村父母精神健康离不开子女精神赡养的支撑(穆光宗,2004)。长久以来,在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下,中国农村家庭形成了以子女精神赡养为主的传统精神保障体系(费孝通,1983)。但

*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重大冲击和变化对中国——全球农业影响模拟模型的研究和开发”(编号:71761147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户贫困动态演化:理论、测量、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编号:2018M630687),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发展基金人才启动项目(编号:2020FR061)。本文曾入选第十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和2019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作者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评论与建议;同时感谢王建英老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吕开宇为本文通讯作者

① 通过计算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相关数据而得

在农村现实社会中,伴随着大量青壮年人口持续转移至城镇,老年人留守农村,导致精神赡养的主体和客体被迫分离,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传统精神保障体系。由于代际间空间距离增加,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面对面情感交流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子女提供的当面精神慰藉便不得不减弱(张文娟等,2005;Ao等,2016)。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子女外出务工行为如何影响父母心理健康给予了广泛的讨论,普遍认为子女外出后对父母精神慰藉的缺失是导致父母心理健康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Silverstein等,2006;Adhikari等,2011;连玉君等,2015)。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对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通讯联系更加普遍,外出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怀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

事实上,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历来注重代际间的情感维护,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演变,但中国人的这种亲情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代际关系研究课题组,1999)。即便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古代和近代中国,远离父母的游子会通过书信形式,向远方的父母传达思念之情。更是留下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和《曾国藩家书》等传承至今的经典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传统孝道文化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孝敬父母仍是社会公认的重要道德品质。所不同的是,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发展,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通讯联系的手段更加方便、快捷。数据显示,2017年农村家庭手机拥有率超过90%,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2.19%^①。同时,大量通讯、社交软件开始盛行,通讯联系方式更加多样化。农村外出子女可以通过电话、语音视频等现代通讯手段,随时随地以较低的成本与父母联系,代际通讯联系也变得更加普遍、频繁和深入*。现代通讯技术跨越了代际间的空间阻隔,有效拉近了代际间的“情感距离”(Platt等,2014)。

健康经济学理论指出,父母心理健康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精神健康的要素投入(Grossman,1972)。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子女精神慰藉是父母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投入要素(费孝通,1983;穆光宗,2004)。虽然,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面对面情感互动减少给父母心理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有学者指出,子女频繁的通讯交流能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Knodel等,2010)。理论研究还表明,不同特征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呈现出明显差异,女性和老龄人口是精神疾病的易发群体(Lei等,2014;赵忠,2006)。那么,在农村家庭精神赡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外出子女采用通讯方式的精神慰藉是否真的能弥补当面情感交流缺失对父母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从而起到改善父母心理健康的作用呢?对于不同特征的父母,子女通讯联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为现有关于农村子女外出行为对父母身心健康影响的学术研究做出理论逻辑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还能为优化家庭和社会养老资源配置,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

鉴于此,本文在农村子女持续外流和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基于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的新视角,深入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地,首先在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框架下,从理论层面探讨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如何影响父母心理健康;然后,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对不同特征父母影响的异质性;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为优化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和社会养老供给提出相关建议。

^① 数据来源:上海财经大学.2017中国农村互联网应用报告,<http://news.sufe.edu.cn/61/f4/c181a90612/page.htm>

* 通过计算CHARLS2013年和2015年相关数据得出,2015年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进行通讯联系的比例接近90%,家庭中有外出子女通讯联系频率在每周一次及以上的比例由2013年的41.23%增加至2015年46.28%,具体可参见图2

二、文献综述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窘境。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子女赡养仍是父母养老的重要方式(Kuhn等,2011;Böhme等,2015);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拉大了代际间的距离,这使得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照料和情感支持变得困难(Joseph等,1999)。由此引发的农村留守父母养老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重点探讨了子女外出行为对父母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现有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子女外出行为影响父母身心健康的总体效应进行评估,二是就子女外出行为影响父母身心健康的机制进行探讨与分析。在精神健康总体评估方面,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均未得出一致结论。有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导致留守父母精神健康水平显著下降(杜鹏等,2004;Adhikari等,2011;Antman,2016;Ao等,2016;温兴祥等,2016;Song,2017),有的研究则认为子女外出并未显著影响父母精神健康(Abas,2009;Böhme等,2015),还有研究发现子女外出能够改善父母的精神健康水平(王小龙等,2011;刘畅等,2017)。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除研究所用数据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因为子女外出行为会通过多个路径影响父母精神健康,并且不同路径的影响方向可能相反,而忽略对不同影响方向的机制分析,最终会导致总体评估结果的不一致(连玉君等,2015;刘畅等,2017)。

因此,有文献就子女外出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和验证。学者们主要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方面,分析外出子女赡养行为变化如何影响父母精神健康。在经济支持方面,研究表明,农村外出务工子女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经济收入增加使父母有机会改善健康投入,例如饮食、休闲或医疗保障水平等,这些健康投入同时影响着父母的生理和心理健康(Baldassar,2007;Frank等,2009;Adhikari等,2011)。关于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农村外出子女经济支持作为一种转移性收入对父母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刘畅,2017)。虽然农村外出子女可能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由于空间距离限制,其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却在减少。实证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的缺失不利于父母精神健康(Hugo,1995;张文娟等,2005;Chang等,2011)。针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经验分析表明,有外出子女的家庭中,父母承担的农业劳动、家务劳动、隔代照料负担加重,这给父母健康福利带来负面影响(孙鹃娟,2006;李琴等,2009;左冬梅等,2011)。

子女赡养功能不仅包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还包含精神慰藉(穆光宗,2004),并且情感慰藉是比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更能直接促进父母精神健康的方式(Silverstein等,1994)。在精神慰藉方面,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子女减少与父母的情感互动会拉大代际间的关系距离,使老年人感到孤独和不满从而影响父母精神健康(Silverstein等,2006;舒玢玢等,2017;敖翔,2018),另外父母对外出子女的担心和顾虑,同样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Antman,2010)。然而已有关于精神慰藉方面的研究多是从理论或者逻辑层面说明外出子女精神慰藉功能减弱可能会影响父母精神健康,而对现代通讯技术普及下农村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的影响关注不够。

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基于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的新视角,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否改善父母精神健康,从而在农村养老资源有限条件下,探索改善农村父母精神健康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二,在研究设计方面,首次将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拓展应用于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父母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充分讨论并采取针对性解决方法。上述改进除能增强对该类问题的理解深度外,还能提升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理论框架与实证模型

(一) 理论框架

经济学家将健康视为一种人力资本 (Mushkin, 1962)。在人力资本理论上, Grossman (1972) 基于健康资本视角提出健康需求模型, 该模型奠定了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研究的理论基础 (Grimard 等, 2010; 刘宏等, 2011), 本文以此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

Grossman (1972) 认为父母健康行为的目标是在约束条件*下, 追求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为实现效用最大化, 父母可以决定第 t 个时期的最优健康水平 (H_t^*)。但父母需要通过投入生产健康的要素用来维持或者改善健康水平。也就是说, 父母精神健康水平取决于生产精神健康的要素投入。理论上, 生产精神健康的投入要素有多种, 如心理咨询 (Beaulac 等, 2011)、社交活动 (Takeda 等, 2015; 鲁小亚等, 2019)、配偶支持 (Lehane 等, 2018) 等, 本文重点关注的“子女精神慰藉”同样可视作用于生产精神健康的投入要素, 并且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农村地区, 这种要素是重要且独特的 (穆光宗, 2004)。

Grossman (1972) 给出了消费者实现最优健康水平的均衡条件**:

$$\gamma_t = r + \delta_t \tag{1}$$

其中, γ_t 代表投资健康的边际货币收益率, 也称为健康资本的边际效率 (Marginal Efficiency of Health Capital, MEC), $\gamma_t = W_t G_t / \pi_{t-1}^{***}$ 。(1) 式右边则代表投资健康的边际资本使用成本, 包含利率 r 和折旧率 δ_t 两方面****。

接下来, 在 Grossman 模型的均衡条件下, 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说明父母最优精神健康水平决策, 以及外出子女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会如何影响父母的精神健康, 如图 1 所示。首先, 考虑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情况, 这时父母如果想从外出子女处获得情感支持的话, 只能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但由于空间距离的阻隔, 代际间情感交流的成本较高。此时, 假定生产精神健康的边际收益曲线****为图 1 中的 MEC 曲线, S 代表生产精神健康的边际货币使用成本曲线****, 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父母的最优精神健康水平 H_t^* 。

然后, 考虑在有现代通讯技术的情况下, 父母如果想从外出子女处获得情感支持的话, 除能与其面对面交流外, 还能够及时、低成本地与外出子女取得通讯联系并交流情感。这意味着现代通讯技术降低了代际间远距离情感交流的成本, 即降低了父母获得外出子女情感支持的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此时, 投资精神健康的边际成本 (π_{t-1}) 减小。所以精神健康的边际收益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 由图 1 中的 MEC_{ICT} 曲线表示, 而 S 曲线并未变化。此时, 父母的最优精神健康水平则由 H_t^* 增加至 H_t^{*ICT} 。

通过理论分析不难发现, 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 当父母可以与外出子女进行通讯方式的情感交流时, 父母精神健康水平将会得到改善。

* 与一般的消费者决策模型不同, 健康需求模型中消费者面临着预算约束和时间约束两个约束条件

** 为便于分析又不失一般性, 文中给出的是简化后的均衡条件, 即仅考虑健康的投资品特征。原均衡条件表达式为: $\gamma_t + \alpha_t = r -$

$\tilde{\pi}_{t-1} + \delta_t$, α_t 代表健康在效用层面获得的收益率, Grossman 称之为精神收益率 (The Psychic Rate of Return), $\tilde{\pi}_{t-1}$ 为边际成本变动率

*** 其中, W_t 表示工资率; G_t 表示健康资本生产健康时间的边际生产力, $G_t = \partial h_t / \partial H_t$, h_t 为父母可消费的总健康天数; π_{t-1} 表示第 t-1 期投资健康的边际成本, $\pi_{t-1} = d C_{t-1} / d I_{t-1}$, C_{t-1} 为第 t-1 期用于投资健康的总成本

**** 其中, 利率 r 表示了资金用于投资而放弃的利息, 也就是投资资金的机会成本; δ_t 是第 t 期的健康折旧率, 折旧率是外生的, 但与个人的年龄有关

***** Grossman (1972) 指出健康资本生产健康时间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 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学规律, 因此, 由边际收益曲线 MEC 的表达式可知, 该曲线斜率为负, 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

***** 由于 $r + \delta_t$ 不受健康资本存量的影响, 因此边际成本曲线 S 为一条水平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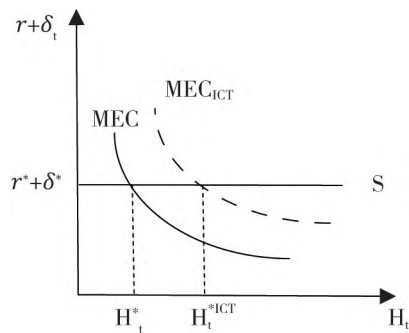


图1 最优精神健康水平的比较静态分析

(二) 实证模型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两期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是否会改善父母精神健康。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H_{it} = \beta C_{it} + \theta Z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其中, H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i*个父母在第*t*期的精神健康状况; C_{it} 为外出子女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变量; Z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为因个人而异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正确衡量父母精神健康,是研究精神健康问题的关键。在多种学科关于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常使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开发的抑郁症量表(CES-D)所测量的抑郁程度来衡量精神健康水平(Erbsland等,1995;Beekman等,1997;Ohrnberger等,2017)。本文同样选取此指标来衡量父母精神健康水平。CHARLS问卷采用CES-D量表方法,在问卷中设计了10道涉及受访者上周感觉及行为的问题,其中有8道消极问题和2道积极问题,每个问题的答案均为问题发生的频率,根据受访者所选项,10道题的累计分数为CES-D得分*。CES-D得分在10~40之间,得分越高意味着父母的抑郁程度越高,精神健康水平越低。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外出子女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CHARLS问卷中统计的通讯方式主要包括电话、短信、电子邮件联系等多种方式。借鉴已有研究,选取外出子女与父母的通讯联系频率来衡量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通讯方式情感支持的力度,通讯联系频率越高代表着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力度越大。如果有多个子女外出将选取所有外出子女中通讯联系频率的最高频率(宋月萍,2014)。

根据Grossman模型,控制变量集 Z_{it} 中主要包括以下变量:年龄,可看作健康折旧率的代理变量;受教育水平,可看作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其他精神健康的投入要素,包括从配偶和亲朋处所获得的精神慰藉;父母劳动情况,从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庭劳动两方面衡量;子女特征,具体包括子女平均年龄、外出子女比例、外出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子女居住安排,其中子女外出比例和子女居住安排一定程度上代表父母获得子女照料和当面情感交流的情况,例如外出子女比例越多、没有子女与自己共同居住意味着父母获得子女照料和当面情感关怀的难度就越大,子女提供的上述支持可能越少;生活水平,利用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衡量。另外,还有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例如初始健康水平、健康素养与意识、家庭健康遗传情况等变量,往往不会在短期内变化,这些变量包含在了 μ_i 中。主要变量及其衡

* 具体的计分方法是,对于消极问题,例如: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4个选项中表示出现频率最低的计1分,次低的计2分,次高的计3分,最高的计4分;而积极性问题的计分方式则相反,即出现频率最低的计4分,次低的计3分,次高的计2分,最高的计1分

量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设定

变量	描述	赋值/单位
抑郁程度	受访者 CES-D 得分	分数
认知水平	受访者对 10 个词语短期记忆个数和延时记忆个数的平均数	个数
生活满意度	受访者主观的生活满意程度,反映受访者对生活的总体评价	1=一点也不满意,2=不太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极其满意
子女通讯联系	受访者与所有外出子女通讯联系频率中的最高频率	0=几乎不联系,1=有子女能每年联系 1 次,2=有子女能每半年联系 1 次,3=有子女能每 3 个月联系 1 次,4=有子女能每月联系 1 次,5=有子女能每半月联系 1 次,6=有子女能每周联系 1 次;7=有子女能每周联系 2~3 次,8=有子女能每天联系 1 次
年龄	受访者年龄	年
性别	受访者性别	0=母亲,1=父亲
受教育水平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年
配偶慰藉作用	受访者是否与配偶同住	0=否,1=是
社交活动	过去一个月,受访者是否有以下社交活动:与朋友交往、帮助亲友、上网	0=否,1=是
家庭劳动	受访者是否照料孙辈	0=否,1=是
农业劳动	过去一年,受访者有没有从事 10 天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0=否,1=是
外出子女比例	受访者子女中常住地在受访者住地所在县以外的其他区域的个数与全部子女个数的比例	%
子女平均年龄	全部子女的平均年龄	年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过去一年全部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包括现金和实物)数量	千元
居住模式	是否有子女与受访者共同居住	0=否,1=是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等于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包含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经营、工资性、转移性收入	千元
是否领取养老金	受访者是否参与了养老保险	0=否,1=是
上一期心理健康	受访者上一期抑郁程度得分	分数
上一期身体健康	受访者上一期 5 项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项目独立完成的个数	个数
慢性病个数	医生曾经告诉受访者的慢性病患病个数	个数
是否有手机	受访者是否有手机	0=否,1=是
本村供电天数	本村一年中正常供电的天数	天

四、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CHARLS 是一项全国性的专门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调查对象为年龄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该项目采用多阶段 PPS 抽样方法,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28 个省份中随机选取 150 个县、450 个社区(村)开展调查访问,截至 2015 年全国追访时,应答样本总计 1.18 万户家庭中的 2.03 万名中老年人。CHARLS 问卷内容包括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医疗保障、工作、退休和养老金、家庭结构和子女代际支持、人口基本信息以及社区(村)基本情况等。CHARLS 全国基线调查始于 2011 年,每两年追踪一次,目前已公开的数据有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3 期数据。本文中主要使用 CHARLS2013 年和 2015 年两期数据。

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如何影响中老年父母精神健康,所以选取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且至少有一位外出子女的年满 45 岁的中老年父母作为研究样本。在此需要界定外出子女,本文的“外出”更多体现在较长距离的迁移,借鉴已有研究,将常住地在父母住地所在县以外的地区的子女界定为外出子女*(刘畅等,2017)。在剔除城镇样本以及没有外出子女的样本后,获得 9868 个研究样本**,其中 2013 年和 2015 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4965 个和 4903 个,两年均有观测值的样本量为 6390 个。所用研究样本覆盖除北京、上海、天津、海南、宁夏、西藏和港澳台以外的 25 个省份。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2 所示,在精神健康方面,父母抑郁程度 CES-D 平均得分为 18.67。按照常规的抑郁症定义,CES-D 得分大于 20 则被认为患有精神抑郁症状。经计算,样本中约有 32% 的父母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抑郁。从个体特征来看,父母平均年龄为 61 岁;父亲人数占 48%,母亲人数占 52%,性别比例基本持平;样本反映出农村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5 年;大约有 88% 的样本,配偶健在并与其共同居住;在劳动方面,有 68% 的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超过 40% 的父母需要照料孙辈。从子女特征来看,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约为 3710 元/年,家庭子女的平均年龄为 33.47 岁;与子女同住的父母约占样本总体的 42%。

如图 2 所示,2013 年外出子女与父母进行通讯联系的比例约为 81%,2015 年该比例增加至 90% 左右;有外出子女通讯频率能在每周联系 1 次及以上的比例由 2013 年的 41.23% 增加至 2015 年 46.28%。这反映出,农村家庭中外出子女与父母通讯频率呈增加趋势,并且代际间通讯联系已相当普遍。图 3 展示了外出子女通讯联系与父母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由图 3 不难发现,整体上随着外出子女联系频率增加,父母 CES-D 得分均值在降低,子女通讯联系频率与父母抑郁程度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在联系频率较低,即通讯联系为几乎没有和每年 1 次时,两者间并未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这种现象可能由多方面原因导致,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外出子女感知到父母精神状况良好,可能认为没有必要与父母进行频繁的联系,因此减少了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者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下文会进一步讨论并处理该问题。

* 包括在外务工,以及通过考学、参军、婚姻等途径迁移至外地就业、生活的子女

** 2013 年和 2015 年 CHARLS 数据中,居住在城镇的家庭比例约为 40%;没有外出子女的农村家庭占全部农村家庭的比例约为 52%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抑郁程度	9820	18.67	5.91	10.00	40.00
认知水平	9764	2.94	1.92	0.00	10.00
生活满意度	9165	3.23	0.79	1.00	5.00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9868	4.62	2.39	0.00	8.00
年龄	9868	61.07	9.55	45.00	102.00
性别	9868	0.48	0.50	0.00	1.00
受教育水平	9868	4.56	4.09	0.00	17.00
配偶慰藉作用	9868	0.88	0.32	0.00	1.00
社交活动	9868	0.36	0.48	0.00	1.00
农业劳动	9862	0.68	0.47	0.00	1.00
家庭劳动	9868	0.41	0.49	0.00	1.00
外出子女比例	9868	0.58	0.28	0.10	1.00
子女平均年龄	9863	33.47	9.40	4.20	92.00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9868	3.71	11.89	0.00	610.00
居住模式	9868	0.42	0.49	0.00	1.00
家庭人均收入	9735	4.43	12.69	0.02	650.15
是否领取养老金	9868	0.81	0.39	0.00	1.00
上一期精神健康	7852	18.85	6.29	10.00	40.00
上一期身体健康	8952	4.75	0.77	0.00	5.00
慢性病个数	9868	1.44	1.43	0.00	9.00
是否有手机	9868	0.83	0.37	0.00	1.00
本村供电天数	9868	353.32	32.68	0.00	365.00

数据来源:2013 年和 2015 年 CHARLS 数据

五、估计结果与讨论

(一) 基础回归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如初始健康水平、家庭健康遗传情况等,从而可以解决由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聚类到个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以消除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之间的自相关问题。作为稳健性比较,进一步结合被解释变量数据特征,选择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采用自助法求得聚类自助标准误。

表 3 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种方法估计出的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系数均为负,并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估计结果比较稳健。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抑郁程度有显著负影响,子女通讯联系频率越高,父母抑郁程度越低,精神健康状况越佳。这支持了理论分析结果。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和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女性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说

* 抑郁程度变量的值大于等于 10 且有大量值聚集在 10 值上,因此进一步选择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使用面板数据进行 Tobit 模型估计时,由于固定效应 Tobit 模型找不到个体异质性 μ_i 的充分统计量,而不能进行条件极大似然估计;同时,LR 检验结果拒绝了个体异质性方差为零的原假设,即拒绝了混合 Tobit 模型。因此,文中选择随机效应的面板 Tobit 回归,对基础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模型设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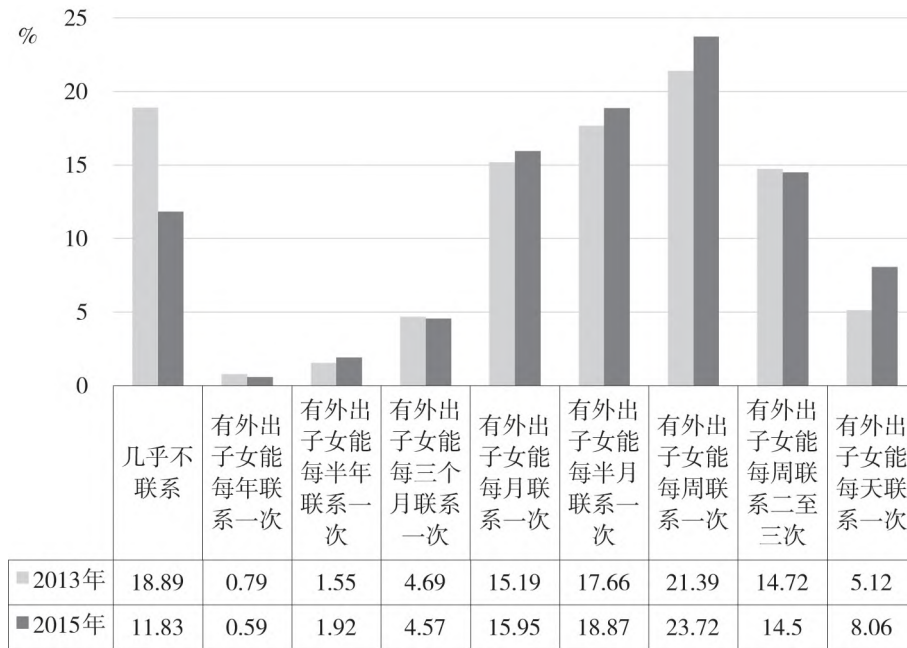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的通讯联系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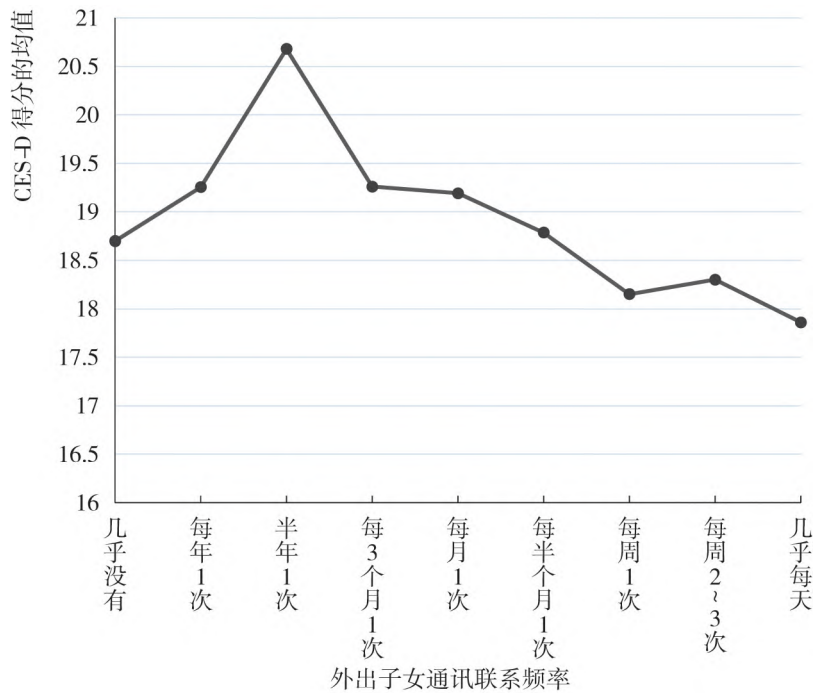


图3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与父母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明女性精神上更脆弱,是精神疾病的易发群体,这与 Lei 等(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年龄增加,父母的抑郁程度越高,精神健康状况更差,这与父母的心理机能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有关;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赵忠(2006)针对中国农村人口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结

论;与配偶共同居住可以减低中老年的抑郁程度,可能原因是,与配偶共同居住既可以相互照顾,还能降低孤独感;结果还显示,与亲戚、朋友的社交活动可以降低中老年人的抑郁程度。

表 3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抑郁程度	
	FE 估计系数	面板 Tobit 估计系数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0.138*** (0.042)	-0.073*** (0.023)
年龄	0.137*** (0.046)	0.012 (0.011)
性别	—	-2.001*** (0.126)
受教育水平	—	-0.159*** (0.016)
配偶慰藉作用	-2.509*** (0.721)	-1.570*** (0.232)
社交活动	-0.480*** (0.184)	-0.548*** (0.135)
农业劳动	-0.105 (0.246)	-0.234* (0.129)
家庭劳动	-0.213 (0.202)	0.068 (0.127)
外出子女比例	-0.175 (0.455)	-0.034 (0.261)
子女平均年龄	0.029* (0.016)	-0.010 (0.009)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0.014 (0.009)	-0.007 (0.006)
居住模式	0.028 (0.222)	0.054 (0.135)
家庭人均收入	0.000 (0.006)	-0.015** (0.006)
是否领取养老金	-0.428* (0.224)	-0.396*** (0.140)
常数项	12.902*** (2.776)	22.294*** (0.702)
观测值		967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聚类标准误。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心理健康衡量指标调整。接下来分别选取认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来衡量心理健康水平。认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也是相关研究中常用来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刘宏等,2011)。同基础回归一样,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估计认知水平方程和主观幸福感方程。作为稳健性比较,进一步结合被解释变量数据特征,选择固定效应 Poisson 模型估计认知水平方程*,使用面板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主观幸福感方程**。

表 4 给出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认知水平方程,还是生活满意度方程,不同方法估计出的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系数均为正,并都在统计上显著。估计结果表明,子女通讯联系频率越高,父母的认知水平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实证结果再次表明子女通讯联系有助于改善父母心理健康。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并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调整心理健康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表明,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心理健康衡量指标调整

变量	认知水平		生活满意度	
	FE 估计系数	Poisson FE 估计系数	FE 估计系数	面板有序 Probit 估计系数
通讯情感支持	0.025* (0.013)	0.009** (0.004)	0.020*** (0.007)	0.035*** (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9622	5754	9036	9036

注:控制变量包括基础回归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下同

2. 通讯联系变量设定调整。选取全部外出子女通讯联系频率的均值和中位数来设定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理论上,均值代表着一组数据的平均水平和集中趋势,也能很好地反映出一个家庭中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水平的高低。考虑到最值可能影响均值,进一步选取中位数加以衡量。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的衡量方式,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数,且估计系数大小与基础回归方程基本一致。调整子女通讯联系变量设定的检验结果表明,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3. 内生性的进一步讨论。尽管计量模型中尽可能控制了影响父母心理健康的可观测因素,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估计结果仍可能受到内生性影响。其原因是,子女通讯联系和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例如父母精神状况越差,外出子女可能越关心父母,从而增加与父母联系的频率。为检验前文估计结果是否受到联立性偏误影响,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尝试从村级和个人两个层面寻找工具变量,分别选取村级正常供电天数和个人是否有手机作为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CHARLS 只公布了 2011 年的村级数据,村级供电天数变量均使用 2011 年村

* 认知水平变量为 0~10 之间的正整数,属于计数数据类型,选择固定效应 Poisson 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固定效应的 Poisson 回归仅适用于平衡面板数据,并且进行固定效应 Poisson 回归时会删除个体异质性 μ_i 的充分统计量为零的样本,也就是认知水平两期取值均为 0 的样本,所以固定效应 Poisson 回归的样本数量明显减少

** 主观幸福感变量的设定为:1=一点也不满意、2=不太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极其满意,属于有序的多值离散变量

*** 限于文章篇幅,在此未列出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索取

级数据来衡量*。由于两期数据中村级供电天数变量并无变化,文中使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表 5 稳健性检验:通讯联系变量设定调整

变量	抑郁程度		变量	抑郁程度	
	FE 估计系数	面板 Tobit 估计系数		FE 估计系数	面板 Tobit 估计系数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均值)	-0.134*** (0.042)	-0.077*** (0.023)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中位数)	-0.127*** (0.041)	-0.077*** (0.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9676		观测值	9676	

工具变量须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通讯联系离不开手机和电量的供应,显然两个变量都满足相关性要求。从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及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来看,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有较好的解释力。在外生性方面,一般而言,村级层面的供电天数不会影响个人的健康行为和精神健康状况,具备良好的外生性。但为控制地区间的系统性差异,在计量模型中纳入了县域层面的固定效应。对于是否有手机变量的外生性讨论和处理要谨慎。是否有手机可能并不只通过“与子女通讯联系”这一条路径来影响父母的精神健康。另一条可能的路径是,父母使用手机与其他亲友通讯联系,交流情感。因此,在计量方程中控制父母与亲友的社交活动情况,以避免是否有手机变量通过此途径影响父母精神健康。表 7 给出的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另外,很多文献中指出,子女外出行为也会受到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从而导致联立性估计偏误。但在本文中,由此原因导致内生性的可能性较弱。其原因是,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问卷调查,受访者当场的测量数据反映的是受访者当期的精神健康状况,而子女外出决策则是前期行为,不会受到当期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但子女外出决策可能会受到父母前期健康状况的影响,所以进一步在方程中控制父母上一期精神健康、上一期身体健康**和慢性病个数^①三个变量。经上述处理,计量方程中的联立性偏误问题应该能被解决。

表 6 给出的估计结果显示,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稳健为负,而且估计系数绝对值较基础回归有所提升。进一步说明,忽略父母精神健康与子女通讯联系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就可能低估子女通讯联系改善父母精神健康的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并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三) 异质性分析

前文分析发现子女通讯联系有利于改善父母精神健康,那么针对不同特征的父母,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对此问题的分析,有助于识别不同群体的异质性,还能为未来农村养老政策制定的目标选择提供依据。接下来,重点考察子女通讯联系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父母影响的异质性。

* 这可能增加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风险,但表 8 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该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

** 在这里分别将 2015 年数据与 2013 年数据合并,2013 年数据和 2011 年数据合并,已获得父母上一期的身心健康数据

① 慢性病一般由于饮食习惯、生活环境、基因等长期因素引发,具有迁延不愈的特点,因此父母患有慢性病的个数可以作为以往健康状况的一个代理变量(刘畅等,2017)

表 6 稳健性检验:IV-2SLS 估计

变量	抑郁程度	
	2SLS	
	第一阶段 估计系数	第二阶段 估计系数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	-0.477*
	—	(0.284)
是否有手机	0.583***	—
	0.078	—
本村供电天数	0.003***	—
	0.001	—
控制变量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7668

注:控制变量除包括基础回归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外,还包括上一期心理健康、上一期身体健康、慢性病个数三个变量

表 7 过度识别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过度识别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	
原假设 H0: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		原假设 H0:工具变量的系数为 0	
X2 统计量	0.327	F 统计量	32.332***
p 值	0.567	p 值	0.000

1.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改善父母心理健康,是否与父母性别有关?父亲和母亲在精神上存在先天性差异(韦艳等,2010),母亲比父亲精神上更容易受到影响,更注重情感回馈(Doherty等,1995)。因此,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亲和母亲心理健康的改善作用和效果可能有所不同。首先按照父母性别将父母分为母亲组和父亲组进行分组回归;其次在基础计量模型中纳入子女通讯联系与性别的交互项进行全样本回归,用以检验子女通讯联系的影响是否与父母性别有关。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在母亲组和父亲组中子女通讯联系变量估计系数均为负,但母亲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父亲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并且母亲组估计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时,子女通讯联系与性别交互项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通讯联系对母亲和父亲的影响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子女通讯联系对母亲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父亲心理健康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

2.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改善父母心理健康,是否与父母年龄有关?同样采用分组和交互项两种方法考察父母年龄异质性。将年龄在 45~60 岁的父母划为中年组,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父母划为老年组。表 9 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组中子女通讯联系估计系数均为负,中年组估计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老年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子女通讯联系与年龄交互项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子女通讯联系对不同年龄父母心理健康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子女通讯联系能显著改善中年父母心理健康,但并未明显改善老年父母心理健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现实中年迈父母的心理机能和生活能力均下降,他们可能更需要子女提供面对面的情感关怀和生活上

的照料,因此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并未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二是老年父母对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尤其是对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接受与使用能力较弱,可能导致子女通讯情感支持的效果未得以体现。

表8 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

变量	抑郁程度		
	母亲组	父亲组	全样本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0.183*** (0.060)	-0.078 (0.058)	-0.205*** (0.058)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性别	—	—	0.138* (0.080)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4986	4690	9676

表9 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的年龄差异分析

变量	抑郁程度		
	中年组	老年组	全样本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0.196*** (0.057)	-0.073 (0.066)	-0.271*** (0.082)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年龄	—	—	0.094* (0.053)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4526	5150	9676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数据,基于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新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了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抑郁程度有显著的负影响,通讯联系频率越高,父母抑郁程度越低。这表明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够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水平。通过调整精神健康衡量方式、调整子女通讯联系变量设定方式以及使用工具变量解决联立性偏误等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始终保持不变。研究还发现,女性和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更差,是精神疾病的易发群体。进一步对父母特征异质性的分析发现,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改善效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对于精神疾病易发的农村女性和老年群体而言,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母亲精神健康,但未明显改善老年父母精神健康。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与现实意义。首先,现代通讯技术在家庭养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嵌入现代通讯技术的“新时代家书”在改善农村父母精神健康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未来在伦理和文化层面,提倡农村外出子女多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当面对面交流受到限制时,鼓励外出子女采用通讯手段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充分发挥子女通讯联系“家书抵万金”的作用。其次,农村父母年龄因素与智能通讯技术适应能力密切相关,老龄父母对信息通讯技术和设备的接受与使用

能力较弱,导致子女通讯联系对老龄父母精神健康的改善作用有限。因此,仅依赖子女精神赡养方式调整,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老龄人口精神赡养问题,需要社会养老做出针对性补充。未来农村养老政策制定应关注技术变革所引致的家庭养老方式变化,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互补融合,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精神健康状态,为推进积极老龄化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力保障。

参 考 文 献

1. Adhikari, R., Jampaklay, A., Chamratrithirong, A.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 *BMC Public Health*, 2011, 11(1): 143~143
2. Antman, F. M. How Do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ffect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Evidence from Mexico, Working Paper, 2016
3. Ao, X., Jiang, D., Zhao, Z.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Pare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 126~139
4. Baldassar, L.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Aged Care: The Mobility of Care and the Migrancy of Ageing.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7, 33(2): 275~297
5. Beaulac, J., Carlson, A., Boyd, R. J. Counseling on Physical Activity to Promote Mental Health: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Family Physicians.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 2011, 57(4): 399~401
6. Beekman, A. T., Deeg, D. J., Van Limbeek, J., Braam, A. W., De Vries, M. Z., Van Tilburg, W. Criterion Validity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Results from a Community-Based Sample of Older Subject in the Netherland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97, 27(1): 231~235
7. Böhme, M. H., Persian, R., Stohr, T. Alone but Better off?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in Moldov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5, 39: 211~227
8. Chang, H., Dong, X. Y., MacPhail, F. Labor Migration and Time Use Pattern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2): 2199~2210
9. Doherty, R. W., Orimoto, L., Singelis, T. M., Hatfield, E., Hebb, J. Emotional Contagion: Gender and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95, 19(3): 355~371
10. Erbsland, M., Ried, W., Ulrich, V. Health, Health Care, and the Environment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German Micro Data. *Health Economics*, 1995, 4(3): 169~182
11. Frank, R., Palmacoca, O., Raudauesquivel, J., Olai Fernandez, G., Diazolavarrieta, C., Acevedogarcia,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ittances and Health Care Provision in Mexico.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9, 99(7): 1227~1231
12. Grimard, F., Laszlo, S. Lim, W. Health, Aging and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in Mexico.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0, 29(5): 630~640
13. Grossman, M.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2, 80(2): 223~255
14. Hugo, 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Some Observations from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995, 4(2~3): 273~301
15. Jia, J., Wang, F., Wei, C., Zhou, A., Jia, X., Li, F., Dong, X. The Prevalence of Dementia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Alzheimers & Dementia*, 2014, 10(1): 1~9
16. Knodel, J., Kespichayawattana, J., Saengtienchai, C., Wiwatwanich, S. How Left Behind are Rural Parents of Migran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ailand. *Ageing & Society*, 2010, 30(5): 811~841
17. Kuhn, R., Everett, B. G., Silvey, R.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Elderly Kin's Health: A Counterfactual Approach. *Demography*, 2011, 48(1): 183~209
18. Joseph, A. E., Phillips, D. R. Ageing in Rural China: Impacts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in Family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9, 14(2): 153~168
19. Lehane, C. M., Hofsoe, S. M., Wittich, W., Dammeyer, J. Mental Health and Spouse Support Among Older Couples Living With Sensory Loss.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018, 30(8): 1205~1223
20. Lei, X., Sun, X., Strauss, J. S., Zhang, P., Zhao, 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ES among the Mid-Aged and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National Baselin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 120(11):

224~232

21. Mushkin, S. J. Health as an Invest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 129~157
22. Abas, M., Punpuing, S., Jirapramukpitak, T., Guest, P., Tangchonlatip, K., Leese, M., Prince, M.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Depression in Ageing Family Members Left Behind.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9, 195(1): 54~60
23. Ohmberger, J., Fichera, E., Sutton, M. The Dynamic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2017, 9(C): 52~62
24. Parker, M. G., Thorslund, M. Health Trends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Getting Better and Getting Worse. *Gerontologist*, 2007, 47(2): 150~158
25. Platt, M., Yeoh, B. S. A., Acedera, K. A., Yen, K. C., Baey, G., Lam, T. Migration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Use: A Case Study of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Working Paper, 2014
26. Song, Q. Aging and Separation from Children: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Adult Migration for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7, 37(55): 1761~1792
27. Silverstein, M., Bengtson, V. L. Doe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The Contingencies of Declining Health and Widowhoo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4, 38(7): 943~957
28. Silverstein, M., Cong, Z., 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61(5): 256~266
29. Takeda, F., Noguchi, H., Monma, T., Tamiya, N. How Possibly Do Leisure and Social Activities Impact Mental Health of Middle-Aged Adults in Japan: An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PLOS ONE*, 2015, 10(10): 1~10
30. Wang, C. W., Chan, C. L. W., Yip, P. S. F. Suicide Rat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1: An Update.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4, 49(6): 929~941
3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Response from the Health and Social Sectors at the Country Level. Sixty-fif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2012
32. 敖翔.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南方人口*, 2018, 33(4): 71~80
33. 杜鹏, 丁志宏, 李全棉, 桂江丰.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 *人口研究*, 2004(6): 44~52
34.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7~16
35. 李琴, 宋月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 *中国农村经济*, 2009(5): 52~60
36. 连玉君, 黎文素, 黄必红. 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15, 14(1): 185~202
37. 刘畅, 易福金, 徐志刚. 父母健康: 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影响的再审视. *管理世界*, 2017(7): 74~87
38. 刘宏, 高松, 王俊. 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1, 46(4): 80~93+106
39. 鲁小亚, 刘金海. 乡村振兴视野下中国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及未来治理——基于“社会结构—精神方式”分析路径. *农业经济问题*, 2019(3): 61~69
40. 罗玉峰, 孙顶强, 徐志刚. 农村“养儿防老”模式走向没落——市场经济冲击 VS 道德文化维系. *农业经济问题*, 2015(5): 22~30+110
41. 穆光宗. 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4): 124~129
42. 舒纷纷, 同钰莹.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 不远游”. *人口研究*, 2017, 41(2): 42~56
43. 宋月萍.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 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 *人口与发展*, 2014, 20(4): 37~44
44. 宋嘉豪, 郑家喜, 吴海涛. “养儿防老”还是“养儿啃老”: 男性子嗣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 *农业技术经济*, 2019(12): 131~142
45. 孙鹃娟.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 *人口学刊*, 2006(4): 14~18
46. 王小龙, 兰永生. 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公共服务供给. *南开经济研究*, 2011(4): 21~31+107
47. 韦艳, 刘旭东, 张艳平. 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孤独感的影响研究. *人口学刊*, 2010(4): 41~47
48. 温兴祥, 肖书康, 温雪. 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 2016(5): 64~73
49. 张文娟, 李树苗.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研究*, 2005(5): 73~80
50. 赵忠. 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管理世界*, 2006(3): 78~85
51. 中国代际关系研究课题. 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今天的青年人和昨天的青年人——实证研究报告. *人口研究*, 1999(6): 56~62
52. 左冬梅, 李树苗.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8(2): 93~100+127

53. 潘东阳,刘晓昀. 社会交往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 PSM 模型的计量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2020(11): 71~82
54. 李 旻,迟美灵,谭晓婷. 农村随迁老人福利的测度及差异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2020(7):117~130
55. 王小增,王林萍. “新农保”拉近了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吗——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2020(6): 90~102
56. 牛文涛,姜润鸽. 新中国 70 年的农村养老保障: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 农业经济问题,2020(2):54~64
57. 卫龙宝,毛文琳. 不同筹资渠道的卫生支出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健康影响的差异——基于 CHARLS 数据的经验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2019(10):53~63
58. 赵连阁,邓新杰,王学渊.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农业经济问题,2018(7):96~107
59. 朱 晨,杨 晔. 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基于“千村调查”的数据. 农业技术经济,2017(12):76~87
60. 赵强社. 农村养老:困境分析、模式选择与策略构想. 农业经济问题,2016(10):70~82+111

Can Rural-urban Migrant Children's Mobile Communication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Parents

ZHANG Chi, SHI Haibo, ZHANG Chongshang, LYU Kaiyu

Abstract: Communic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mean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ma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arents' spiritual life and welfa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migration of rural adult childre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ICT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3 and 2015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grant children's mobile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by ICT on parents' ment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ldren's mobile communication can improve parents' mental health. The more often children communicate by mobile, the better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ir parent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 test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remain unchanged.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varies across parents' gender and age. For rural females and elder who are vulnerable to mental illness, children's mobile communication can improve mothers' mental health, but can not improve elderly parents' mental health significantly. The advent and wide use of ICT greatly facilitate parents' mental health. However, children's mobile communication has a limited impact on the elderly parents'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rural pension policy, in the futur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ildren's support behavior's change caused by ICT,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care and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ural-urban migrant children; Parents' mental health; Children's spiritual support for parents

责任编辑:赵 倩